

# 走向环境可持续的东亚地区

## ——第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虎彪 施国庆 石蕾蕾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当前环境可持续问题成为东亚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2011 年 10 月在韩国加图尔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着福岛核电站灾难、环境污染及受害者赔偿、环境政策、生态与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及应对、环境意识与生活方式、农村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理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交流。

**关键词:**环境可持续;东亚;第三届国际环境社会学;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2)02-0043-04

2007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与河海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三国四地的学者在北京发起并建立了东亚环境社会学网络。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和中国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先后承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1 年 10 月 21~23 日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承办的第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加图尔大学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走向环境可持续的东亚地区”。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30 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美国环境社会学学会奠基人、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邓拉普(Riley E. Dunlap)教授,韩国加图尔大学李时载(See-Jae Lee)教授分别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会议主要围绕以下 8 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 一、福岛核电站灾难的影响及反思

本次会议是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网络在福岛核电站灾难后召开的首次会议。福岛核电站灾难所带来的影响及反思自然成了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除主题报告和论坛外,在本次会议结束前还举行了“面对日本灾难(福岛核泄漏)挑战的环境社会学思考”的专场讨论。一些学者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对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原因、影响及核电站未来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福岛核电站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船桥晴俊(Harutoshi Funabashi)(日本法政大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福岛核电站灾难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社会机制和社会背景、制度框架、政治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灾难,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技术的失败也是多种社会防护措施失败的结果。福岛核电站的灾难是技术和社会因素失败结合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对日本能源范式和公共领域的决策范式进行改革。

朴宰默(Jae-Mook Park)(韩国忠南国立大学)关注了日本的福岛事故对韩国反核设施运动的影响,他用框架过程作为理论框架比较了福岛事故前后韩国反核设施运动的变化。研究发现,后福岛时代的环境运动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运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如运动中体现出文化的含义;二是动员的水平发生了变化。动员的水平比以前有所降低。

韩国李时载(韩国加图尔大学)则围绕“福岛核电站之后,我们能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东亚地区做什么?”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福岛核电站的事故,然后介绍了东亚如韩国、日本和中国核电站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这使得东亚地区的人们都成了核电站事故及可能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者,但由于核能的研究是“宏大科学”,普通人不容易理解和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在福岛事件之后,韩国还在实施积极寻求核电发展;第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核电体制?从日本和德国的经历

收稿日期 2012-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SH010)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5814)

作者简介 张虎彪(1974—),男,湖南双峰人,讲师,博士后,从事环境社会学、移民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研究。

中可以发现建立无核能源体系的可能性,如通过能源消费的减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途径来实现。第四,我们应该做什么?他为此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问责方案,如建立互相公开信息的机制;二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推动民主社会及民主决策的实现。总之,东亚的社会学家在反核运动中承担角色,以寻求“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后核世界的到来”。

## 二、环境污染和其受害者

目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其受害者问题也一直是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焦点。野泽淳史(Atsushi Nozawa)日本明治大学)用一种新概念,即“水俣病的后风险”概念来建立针对水俣病受害者的一种未来补偿系统,因为对于受害者来说,环境污染的危害不可能一时半刻终止,而且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即受害者地区患病率的上升,因此必须从时间范围和受害者生命周期来考虑环境风险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补偿系统即包容性的补偿系统来为受害者提供社会服务。

食品污染与环境污染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自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本社会经历了许多环境污染,导致各种环境补偿和公司环境管理问题方面立法的出现。然而,目前对食物污染引起的危害,日本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关于补偿和帮助受害者的立法。宇田和子(Kazuko Uda)日本法政大学)以日本Kanemi石油病为例比较了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引起损失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研究发现:Kanemi石油污染食物的案例中也能发现和环境污染一样的受害者结构,但从法律上看,由于不同的产生原因导致了两种污染的处理方式被区别对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法律上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和不充分的。

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国家或地区对环境污染引发的正义问题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美国不同,中国草根运动的环境抱怨或抗争是简单的、地区性的环境诉求,而且缺乏宏大的理念。刘春燕(上海大学)以中国一个村庄钨矿开采的环境诉求为案例对民营化时代的环境权利进行了反思。研究发现,一些钨矿的开采者通过垄断开采权为自己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却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同时不需要为地方生态的恢复支付任何费用。这种“私人获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不公平感的根源。而村民寄希望于高层政府官员而不是建立平等的法律来保护,希望能建立一种短暂但

有效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建立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历史背景、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当地居民公平观念中来理解中国的环境正义运动。

## 三、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及其影响的重要手段及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受到了批评。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难以避免采取这种发展和环境治理模式。陈阿江、罗亚娟(河海大学)以卯集镇皮革制造业的发展和环境制约问题为例来阐述中国“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路径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府、企业等在环境污染中的角色定位问题进行了反思。

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各国政府都需要制定一些新的环境政策,如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寺田良一(Ryoichi Terada)日本明治大学)在对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出台的社会背景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实施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环境问题及政策在社会背景上的差异,政策的变化和扩散不可避免地对政策本身进行或多或少地修订,如美国的政策强调社区知情权问题,而日本和韩国则强调中央政府的环境管理。这个污染物排放的制度非常适用于新型工业化的国家来减少环境风险。

废品回收系统也是一个社会系统。日本政府自从20世纪90年代制订了5部废品回收法,其中日本容器和包装品回收法试图通过政府、企业和市民责任共担的原则以建立一种新的回收系统。汤浅洋一(Yoichi Yuasa)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研究认为,实际上,这种新的回收系统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建立新的回收系统,需要关注和改变目前覆盖日本国内外的复杂物质流活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目前这种系统的平衡性,尤其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阐述清楚目前相关行动者(如政府、企业和市民)所操纵的这些系统和行为的平衡性。

## 四、生态和历史

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研究不仅研究自然环境,还要研究人为环境。环境社会学家把传统的城镇风景和历史建筑物看成是“历史环境”的一部分。最近,一些社区通过获得世界遗产的称号或对历史建筑的保存来发展旅游业。因此那些呈现痛苦记忆(环境污染、灾难、战争的破坏)的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易成为一个热门而又有争议的话题。“城市、记忆和保存”研究小组对日本的福山市和长崎以及泰国

的清迈府 3 个案例进行了研究。森久哲( Satoshi Morihisa )(日本法政大学)研究了福山市的拆迁案例中呈现出的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支持拆迁的认为,这个方案有利于减少交通拥挤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它也是一个城镇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反对拆迁的认为,如果实施这个方案,则失去了它自己的历史认同。研究发现,这种冲突不仅仅是“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对抗,更是由于社区成员对其遗产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也表明一个地方社区的社会纽带和自然环境存在着某种关系。

深谷直弘( Fukaya Naohiro )(日本法政大学)研究了长崎市考察保护原子弹爆炸中幸存建筑的保护运动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它集中研究了原子弹爆炸中幸存的“新兴善小学保护运动”。Kozen 区的本地居民和民间团体对保护分别赋予了不同含义,当地居民认为保存是为了纪念“当地居民的老学校”。而民间团体坚持认为是原子弹爆炸时受伤的人得到治疗而临时设置的医院。由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没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阻止“新兴善小学”被毁坏。研究发现,保护原子弹废墟的社会条件必须放到生活史以及空间、经济限制等背景的价值中来考虑。这也为环境社会学如何处理战争所造成的废墟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前面两个案例都是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莲见朱加( Ayaka Hasumi )(日本法政大学)所关注的泰国清迈府案例则是关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一起努力保护他们生活的历史区域。清迈地区的人们为反对政府的城市发展计划而建立了保存历史建筑的非营利性联盟,它是由来自不同组织、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志愿者组成的。研究发现,80%的当地居民倾向于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希望能保护其历史和文化遗产,而且他们反对任何可能对社区造成破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 五、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应对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东亚的社会学家对此如何反应呢?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各种组织和媒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反应、低碳城市的建设以及清洁发展机制中的公平问题等进行了探索。

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议。2010 年中国西南地区遭受的特大干旱给探索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变化移

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研究背景。在此特大干旱影响下,当地农村居民是否以及怎样采用迁移的方式来应对?施国庆、余庆年(河海大学)以 2010 年 8 ~ 9 月在受灾严重的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引入“气候变化——人口迁移响应”的基本理论框架模型,考虑公共和私人两个层面的作用,对地方政府、村集体和农户自身的灾后适应行为进行分析和效果评价。研究发现,两个层面适应行为的共同作用缓解了特大干旱给农户生计带来的压力,使得农户家庭成员的迁移并不成为必须的选择。

各种各样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都作出了一些回应。当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的参与诸如水利发展和环境教育等国内问题的政策制定时,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晋军(清华大学)根据对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深度采访以及对三大顶尖报纸报道气候变化的内容分析了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和国内活动上制定不同目标和策略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国内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和新生代环境活动者的出现共同导致了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不同角色。尹宣真( Sun-jin Yun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等对韩国的气候变化政治网络进行了分析,即韩国的主要组织是如何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以及他们又是怎样构建相关政策网络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网络比环境保护网络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林子伦( Tze-Luen Lin )(台湾大学)以台湾 2007 ~ 2008 年的报纸报道为例,用话语和关系网络途径分析了气候变化媒体话语是怎样形成和呈现的及其原因以及反过来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多种行动者和话语网络是如何影响政府气候政策的。长谷川公一( Koichi Hasegawa )(日本东北大学)等则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法比较了 1997 ~ 2009 年 13 个国家的不同主体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研究发现,日本和韩国的政府和企业都比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这可能与东亚文化中易于接受科学的逻辑有关,这还可进一步通过高水平的教育、迅速增长的科学研究能力、经济发展依赖于制造业出口而不是化石燃料的加工等因素来解释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为什么易于接受科学的逻辑。

低碳城市主要通过技术、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减少碳排放来实现。史明宇、陈绍军(河海大学)认为,不管是通过哪种途径,其焦点都在于通过改变城市体系的经济结构来实现低碳城市的目标。然而,人

类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结构,且各个结构之间相互重合、相互作用,因此低碳城市的实现需要对城市的各种结构进行系统的调整。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购买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它既满足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限制目标,同时又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以廉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潜力,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将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减少温室气体。而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几乎无益于当地的发展,并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环境和社会成本。郑敏芝(Min-Ji Jeong)(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使用生态不平等交换的框架分析了这种清洁发展机制交易。研究发现:虽然发达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来补偿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的破坏,但它们也创造了另一种类型的生态不平等交换。

## 六、环境意识与生活方式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环境质量公众关注的调查成为环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目前环境态度研究的关注点已从辨别环境关注的决定性因素转变到考察它和环境负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环境态度研究的不断增长,环境关注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同质型整体的行为。因此,朴熙齐(Hee-Je bak)(韩国庆熙大学)认为,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对不同地理范围环境问题的何种程度的关注可以转化为实际环保行为。哪一层面的关注(本地的、国家的和全球的范围)更有助于对环境负责任的关注程度。除此之外,还研究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收入、教育、年龄等)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影响。

梁钟惠(Jong-Hoe Yang)(韩国成均馆大学)对韩国近30年以来环境关注的总体趋势及其社会基础进行了研究。1982~2010年韩国国民对环境的关注度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70%以上的国民对环境很关注,只在这一阶段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如在2000年到达最高点,总体上成倒U形曲线。研究认为,环境衰退、物质富裕和全球化等理论虽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韩国环境运动的兴起经常先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初,由于韩国遭遇如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导致韩国国民对环境关注的程度发生变化。

除环境关注外,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环境危机要求我们转换生活方式,即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李英浩(Young-Ho Lee)(韩国东国大学)研究了佛教

徒的生活方式对建立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社会的贡献。首先,以从古至今的顺序介绍佛教的生态传统历史案例并得到其精神,其次,以两个案例说明佛教传统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者喜欢这种佛教的生活方式。这种佛教徒生活方式的实践能对社会中高生产和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做出某些改变,并有利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友好型社会。

## 七、农村环境问题

环境社会学不仅关注城市环境问题,而且关注农村(或农业)中的环境问题。本次会议农村环境方面的主题有农村生态技术的传播、本土的种子保护运动及农民协会参与地方政治等。

技术革新的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经济优势的问题,其成功与否起码部分地决定于文化,许多农业技术的传播工程因其这样的非经济或社会文化因素而失败了。陈涛(中国海洋大学)以两个中国农村地区为例来研究生态农业技术传播实践。研究认为,生态技术的传播应该把社会文化方面考虑进去,因为它们将最终决定传播的成功与失败,表面上看,技术标准化(强调技术的一致性)与技术区域化(强调技术的多样性)是相互矛盾的,但它们实际上是高度相关的甚至是一致的。社会适应性的强度是衡量技术传播效果的根本标准。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生态农业技术的传播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种子是食品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得农民的种子被一些跨国公司控制,这引起了一些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的强烈不满,韩国KW-PA本土种子保护运动是一个生态女性主义和农村妇女运动成功结合的案例。金玄真(Hyun-Jin Kim)(韩国大学)研究韩国女性农民运动是如何接受生态女权主义的,并如何把它运用到运动中的,通过认知的维度、技术的维度、组织的维度3个维度来研究运动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本土种子保护运动的出现和发展。

台湾地区在2010年10月25日实行县市合并。这些地方社区行政建制的调整是怎样影响以农村社区为基础的环境运动呢?星纯子(Junko Hoshi)(日本法政大学)以高雄市美浓社区为个案对县市合并下的地方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尽管美浓地方政权经历了县市合并的动荡,但美浓的社会运动仍找到了一种成功参与地方政治的方式。

## 八、环境社会学理论

邓拉普在主题报告中阐述了(下转第89页)

的信息会引起媒体的进一步调查访问和网络信息的搜索,挖掘、搜索出更深层次的信息,不可避免牵涉个人信息的传播、复制。例如“虐猫女”被道德言论征讨谴责之后,与之相关的个人信息全部被公布出来,网民将虐待动物网站的注册信息、域名注册公司的办公地址、办公电话、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甚至法定代表人的车牌号码、私人手机、大学专业、中学所在地、网络购物记录等,都被公布于众。隐私权中将隐私界定为“不受干涉”或“免于侵害”的“独处”的权利<sup>[10]</sup>。网络讨伐对个人信息的搜索、挖掘并在网络空间传播、复制违背了“不受干涉”、“独处”的原则,导致隐私信息的泄露。网络的公开性和便捷性及其多媒体传播功能,对个体信息的泄露导致其对私有信息控制权的丢失,最终导致网络对其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侵害,可能给受害人造成严重的精神和财产损失<sup>[11]</sup>。网络讨伐对信息的层层挖掘、持续追踪,致使个人信息、隐私信息暴露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并被不断传播和复制,对当事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 参考文献:

[1] 埃瑟·戴森. 2.0 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胡泳,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290.

- [2] 虞云耀, 杨春贵. 中共中央党校讲稿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168.
- [3] 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5.
- [4] 王海明. 论品德结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2): 25-29.
- [5]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张企泰, 范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333.
- [6] 张康之.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46.
- [7] 钟瑛. 网络传播伦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0.
- [8] 郑也夫, 彭泗清. 中国社会中的信任[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296.
- [9] 王青松. 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及对策[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6(5): 18-22.
- [10] 吕耀怀. 道德单元[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176-177.
- [11] 张今杰. 信息经济时代公民隐私权的保护[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3(4): 45-50.

(上接第 46 页)环境社会学的主要趋势和最新发展,认为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从建构论和实在论向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转化。1978 年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卡特和邓拉普最早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环境互动”或“关系”的研究。还把环境问题定义为环境问题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不幸运的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主要局限于人为环境方面的研究,如研究房屋和城市设计的特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关系”的讨论趋向于理论化,如卡特的“过度成长”理论和施耐伯格的“生产的永动机”理论。但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尤其在 90 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涌现出大量的底层群体遭受环境不公正的经验研究。在最近 10 年,这种研究经常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来测量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的环境污染暴露情况。而且,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社区、国家,甚至跨国之间的比较等各个层面的都有。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环境社会学领域至此形成了两大阵营:建构论和实在论。这两大阵营引发了一些争论,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妥协相互吸收了对方的观点。虽然“建构论—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结束,但我们仍可看到环境社会学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如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邓拉普把其中一个标签为“环境不可知论”。这种理论主要但不完全使用在欧洲,它通过诠释或理解的方法把环境问题主要是作为一种象征、理念和文化现象来对待,对科学知识整体上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在它们的分析中仍怀疑使用环境问题的数据。这种视角避免了社会—环境的互动,代表了一种现代的“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在理论上的相对成熟,而把另一个主题称之为“环境实用主义”,这种理论视角主要使用在北美国家或地区,它的主要兴趣在环境的物质方面,把环境问题的科学信息作为生态问题的指示器。它们也承认这些数据是社会建构的,可能也是不完美的,但仍发现它们是非常有用的,在经验分析中它们愿意使用环境指标的数据。除理论梳理外,邓拉普还以可持续发展 and 全球变暖为例,对上述两种理论视角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最后,邓拉普还对东亚环境社会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进行了阐释和展望。他认为,随着东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亚的环境社会学家们也将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